

世紀哲人馮友蘭

任繼愈署簽



李真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世纪哲人冯友兰/李真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9. 11

ISBN 978 - 7 - 5434 - 6595 - 4

I. 世… II. 李… III. 冯友兰 (1895 ~ 1990) — 传记
IV. K82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96842 号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050061)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75

印 数 2000

字 数 267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434 - 6595 - 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有一位卓越的哲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在他漫长的、几乎与20世纪共始终的生活

091 颠沛流离于南岳 笔耕不辍于昆明

——西南联大生活片断

痛南渡，辞官阙 / 继续向昆明“转进” / 西南联大生活片断 / 大师云集，教学活跃，著述丰硕 / 关于“双肩挑”及其他 / 千里奔丧回唐河

111 对于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

——“贞元六书”

时代要求与哲学反思 / “最哲学的哲学” / “中国到自由之路” / 觉悟与人生境界 / 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 旧学与新统

142 还燕碛 访宣州 庆解放

生于忧患

育于家学

山川钟秀，人杰地灵

1895年12月4日(农历乙未年十月十六日)冯友兰诞生于河南省唐河县祁仪镇。

唐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紧靠湖北省，与湖北省的枣阳县比邻。从经济区划来看，它与湖北的联系更甚于与河南的联系。距唐河县西北部不远处，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南阳，那是三国时期西蜀名相诸葛亮出山前“躬耕潜学”的“卧龙”之所；也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会聚众多英雄发难起义的基地，最后终于光复汉祚。唐河县西南，邻近新野县。这个虽不起眼的小县，却是刘备当年屯兵小住之地。正是在这里，他礼贡下士，三顾茅庐，先后喜得徐庶、诸葛亮等谋士，从而奠定了功业的基础。这一带更是中国老百姓家喻户晓的赵子龙在曹兵千军万马的围困中，血溅沙场，奋勇救幼主阿斗，以及张飞在长坂坡喝断大桥，惊退曹操大军等英雄故事的威武雄壮的历史舞台。在唐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这个地区仍然人才辈出。有人统计唐代的众多诗人中，出生于河南(其中主要是洛阳和南阳地区)者，占了一半，如杜甫生于河南巩县，岑参出生于南阳，元稹出生于洛阳，等等。“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也出生于河南巩县。真可谓“山川钟秀，人杰地灵”。冯

友兰，这位20世纪的中国伟大哲学家、世纪哲人，无疑又是一位使故乡河南和唐河县增色的卓越人物。

冯友兰出生于一个诗书传家的富裕的地主家庭。据说，先祖是从山西高平县到唐河县来做小生意的，后来就在祁仪镇落户了。冯友兰的祖父名玉文，字圣征，曾应试秀才。“秀才”是清代科举制下在县里应试得中可取得的头衔或资格(当时叫做“功名”，或即意味着一定程度的“功成名就”吧)。据说因为与县官(也就是掌握考试录取与否大权的“父母官”)闹了点别扭，而他又生性耿直，不肯去疏通，终至落第而未被录取，从此便不再应试。但他确有文才，善赋诗，有几十首传下来的诗，被编为《梅村诗稿》。当时新野县一位叫赵一士的名士，为这部诗集题了一首诗：

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
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

这是赵一士对圣征公高风亮节之赞扬。“伊上叟”指宋代大儒邵康节，他著有诗集《击壤集》，取尧时人民击壤而歌，以乐天年之义。赵以《梅村诗稿》与《击壤集》相比，以喻玉文先生恬淡功名而寄情诗文的境界。

玉文先生有三子，长名云异，字鹤亭；次名台异，字树侯；三名汉异，字爽亭。冯友兰的生父排行第二，于1898年(即清光绪戊戌年)中“进士”，是他家中功名最高的。友兰的伯父、叔父也都是县里的秀才。按当时的体制，秀才在省级考试合格，则获得“举人”的资格，举人在京城举行的中央级考试合格再经在紫禁城举行的“殿试”合格者，即获得“进士”头衔。进士中的前十名要由皇帝“朱笔圈定”，其第一名即为该届的“状元”。中了进士的人，就成了候补官员，将由吏部酌情任命为“朝廷命官”。这就是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仕途”。由此可见，冯家在当地也算得上显赫一时的书香之家了。

大概是玉文先生教子有方，又加之孩子们都有一定的天赋，所以，云异(友兰的伯父)、台异(友兰的父亲)均有诗才，前者有《知非斋诗集》，后者有《复斋诗集》。另有一位十几岁时夭亡的女孩(冯友兰的姑姑)，也能作诗。其遗留诗稿，被编为《梅花窗诗草》。从这方面说，冯家又是个典型的“诗书世家”。冯友兰晚年曾颇为自豪地说：“我们这一门有一种作诗的家风。”事实上，冯友兰的诗

文也属上品。可谓家学渊源有自，颇不负诗书世家的盛名。

当然，在封建社会的条件下，书香之家也好，诗书世家也好，都必须有一定的经济收入为基础。冯玉文老先生曾拥有大约一千五百亩土地，当然也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地主家庭。不过，在唐河一带，当时土地集中程度颇高。大地主有拥有土地达两万多亩者，至于拥有土地达几千亩者也大有人在。

冯友兰，字芝生，有弟、妹各一人。弟景兰，后来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任北京地质学院教授。妹淑兰，字沅君，后来成为著名的中国文学教授(山东大学)。他们的母亲名叫吴清芝，曾上过几年学，识文断字，知书达礼(这在当时盛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条件下，已属难能可贵了)。她对子女的教育十分重视，用力颇多。我们从她的子女都卓然成才的事实上，不难看出她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卓越女姓。在这一点上冯友兰对她终身怀有深切的感激和敬意。



青年冯友兰(约为1918年)

时代的忧患与家学的启蒙

要了解冯友兰光辉而又曲折的一生，除了了解他的故乡和家庭这个小环境外，更重要的是了解他的一生所处波澜壮阔、诡谲变幻的社会和世界。

他降生的那一年，1895年，正是近代中国黑色的屈辱年代。一年前，穷凶极恶处心积虑侵略中国的日军在甲午海战中全歼了清政府历时十多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1895年，清朝政府派大臣李鸿章到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被迫割让了台湾、澎湖与辽东半岛，赔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之巨。这一战充分暴露了满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暴露了满清王朝的权贵们奉行的“宁赠友邦，勿与家奴”的卖国、反人民的反动路线。它又一次鲜明地表明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历经1864年的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等奇耻大辱以来，清政府扮演的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投降卖国的角色，实际上已经沦落为替各国“洋大人”镇压搜括中国老百姓的总代办的角色了。中国，这个当时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号称四万万人民的伟大的五千年文明古国，在不到半个世纪

的时光中，已经蜕化为帝国主义列强的“狩猎场”和“俎上肉”，沦为任列强宰割的“猪猡”般的半殖民地了。中国人民被压在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之下，陷于水深火热的民族危亡之中。这是自有中国文明以来未曾有过的史无前例的深重的民族灾难。在这种灾难中，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在思考：富国强兵、拯救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冯友兰诞生后三年，父亲考中了清光绪戊戌(1898年)科进士。这大概是清王朝最后几届中央级的科举取士。正是这一年，清光绪皇帝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维新派人士推动下，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主张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修铁路、练新军。总之，希望学西方之长，以达到富国强兵之目的。但是，这一线希望之光，在守旧派和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腐朽的实权派的联合进攻之下，迅速地被扼杀了。它就像一个垂死病人的回光反照一般，无声地消亡了。中国迎着更大的灾难向黑暗的深渊继续沉沦下去。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又一次再现了1864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的凶恶无耻的嘴脸。在八国联军中就连比利时、葡萄牙这样的“蕞尔小国”居然也趁火打劫，在中国这个“东方太岁”头上来“动土”了！

冯友兰从襁褓到孩提的时代，中国的上空就是这样地乌云翻滚，妖风狂吹。现代中国有志之士，就是在这样的气候和条件下倔强地生长起来的。

此时，暴风雨仍然还未席卷到河南南部这个偏僻的小镇来。冯友兰七岁起在家里聘请的塾师的教导下，与堂兄弟、表兄弟等七八人一起，开始了中国儿童的传统初级教育。他们先读朗朗上口的韵文《三字经》。其内容实际上是一部袖珍型的百科全书，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人文、风土、人情等等都有所涉及。接下来是所谓的“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是儒家正宗的经典，是孔孟之道的传世原版。按内容说，它涉及中国哲学、文学、历史、政治、伦理等方面，对于一个十岁左右的少年儿童，是很难消理解的。中国旧社会长期以来的传统教学理论和方法是：先生吞，后消化。让孩子哇啦哇啦像念顺口溜或念符咒一般，先背诵下来，熟记于心，再慢慢在生活中理解、应用、消化，以致豁然贯通。这当然是一种典型的“注入式”的死记硬背。但是，对于有天赋和理解力的孩子来说，也未必完全是无益的“填鸭”。它就像计算机里的储存一样，一旦有所领悟，则记忆所及，脱口成章，文思可如涌泉一般浮现，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无疑是一种经验主义和

机械主义的方法，但它确实充分利用了孩童发育时期记忆力特强的生理、心理优势。这种教育学上的“拿来主义”，其中的奥秘还是很值得深入研究的。

按照传统的程序，读完“四书”，就该读“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了。这些经书的内容，涉及古代诗歌(《诗》)，古代历史文献典籍(《书》)，古代卜筮哲学(《易》)，古代仪礼(《礼》)，春秋时代官方历史记述(《春秋》)。这些内容对于少年来说，除文学作品《诗经》外，无疑都是极难领悟的。冯友兰在念完《诗经》后，就随母亲到父亲在武昌的任所去了。两年多(1902~1904)的私塾学习，也就暂告一段落。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私塾中，还学了一本新出的《地球韵言》。这是一本讲地理的普及读物，是属于当时“新学”范畴的。它引导人把视线投向当今的世界，了解中华“天朝”之外，世界的地理状况，从而扩大人们的视野。这在当时的私塾中，也算是维新之举措，在四书、五经之外，吹来了一缕清新的风。对此，冯友兰在晚年时称道说：“我们家的那个私塾，也算是新旧兼备了。”(见《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版，下同]卷一，第3页)

随父寓居武昌与崇阳

1904年(即光绪三十年)，冯友兰的父亲在湖北省武昌谋得一个工作，即在“方言学堂”任“庶务委员”。当时在武昌任两湖总督的是有名的洋务派人士张之洞。他对于推进新政颇为着力。方言学堂是一所外国语学校，其目的是培养通晓外语的人才，学生享受公费。学校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是当时的大名士、武昌府知府梁鼎芬。由于梁的这个校长职务是兼职，所以，所谓庶务委员实际上是总管除教务外学校的各项事务。按理说，冯台异中戊戌科进士之后，即取得候补官员的资格。按清末的制度，具备这种候补资格的人，可以自己选择除本人所属省份之外的其他省为候补之地。冯台异选择了毗邻的湖北省。这大约是其离家乡较近的缘故吧。按当时腐败的官场陋规，候补者可以捐一笔钱，以换取吏部在某官出缺后任命的优先权(此谓之“遇缺先”)。冯台异没有捐钱去获取这种“遇缺先”，所以，在没有“得缺”去“补”之前，得到了方言学堂这个工作，也算是一种幸运吧。

于是冯友兰的母亲就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前往武昌父亲的任所。当时的武昌是一个颇有开放新气象的地方。就以办新学堂为例，在全国也属开风气之先。当时武昌新学校的学生，都穿着“制服”，即一身浅蓝色短褂、长裤，虽然有点像当时士兵穿的“号衣”，毕竟也是一种新气象。张之洞还作了学堂歌，让学生学唱。冯氏兄妹因为年纪尚小，还不够进入方言学堂的资格；加上人地生疏，也不放心将孩子们送入当地的小学校。于是就在家里由父母兼作塾师，友兰就继续念“五经”。由于父亲公务在身，教师的重担实际上落在了母亲的肩上。母亲小时虽曾上过几年学，但有些字只能读音，不能解义，甚至有的字也根本不认识，这些困难就只好等父亲晚上回家来时再加以解决。应该说，这是一种相当奇特的教学方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冯友兰“读完了”《书经》、《易经》及一部分《左传》。说“读完了”是很确切的。因为按当时的习惯，念书主要就是读和背诵，至于内容，那就知道多少算多少，等你记住和背得之后，再慢慢去消化。同时也不难看出，这两位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和下工夫。据冯友兰晚年回忆，尽管他们兄弟二人并未正式进学堂念书，家里还是给他们俩作了时兴的“学生制服”。他父亲还经常出题要他们作文，教导他们写文章不可空疏无物，要“文以载道”，要“即景生情，即物见志”。他还将自己写的文章给儿子作示范。凡此种种都可见父母亲望子成才的良苦用心。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他父亲又先后被任命为粤汉、川汉铁路勘测队的“弹压委员”，实际上就是协同勘测队与地方办一些交涉事务。这两条铁路都是张之洞“新政”的内容。冯台异虽不懂铁路技术，但对于此项工作颇尽心尽力，写下了几大本“日志”，对于山川走势，车站设置等问题论证甚详，足见其对新政的热心与思想之开明。他几个月离家，对孩子们的学习可影响不小，念不出来的字就存了不少。好在冯台异回家查问学习进度时，冯友兰正在读的《易经》，他母亲声称已经“包本”了（即从头到尾均可背诵），而冯友兰居然声调铿锵地把《易经·系辞》部分，给父亲背诵了一遍。从这种小事中，足见少年冯友兰是天资聪慧，学习刻苦而颇有所获了。

对于这样一种学习环境，冯友兰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的回忆中，还清晰地记得张之洞作的“学堂歌”的一些片段：

天地泰，日月光，听我唱歌赞学堂。

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无方。

中国圆，日本长，同在东亚地球上。

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冯台异终于获得了补缺的机会。这和他颇为赏识的梁鼎芬大有关系。此时张之洞已应召入京，作了内阁大学士及军机大臣；梁鼎芬已升至“臬台”(按察使)，并代理“藩台”(即布政使)职务。当崇阳县出缺时，梁就委派冯台异前往任“知县”之职。这样冯台异一家就前往崇阳县“履新”了。

冯友兰此时已十二岁，对新知县大人赴任的事，颇感新鲜，而且观察甚详。他清楚地记得他和母亲、弟妹一起在三声炮响声中乘轿进入崇阳县城门以及在三声炮响声中进入县衙门的情景。尤其对县衙的布局有细致的观察。透过它与后来了解到的北京紫禁城的对比，深切体会到它体现的君临天下的皇权的威严。在坐北朝南的县衙大门上边挂着一块竖匾：“崇阳县”(有如旧紫禁城外皇城正中大门上的竖匾：“大清门”)。进了大门，绕过仪门，就是大堂，大堂前面有两排房子，是县衙门“六房”的办公处，东边是吏、户、礼三房，西边是兵、刑、工三房(与位于天安门与大清门之间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衙门”相对应)。大堂正中有一座暖阁，是县官开堂办案时的公座公案之所在(它相当于故宫的太和殿)。通过大堂后边的“宅门”进去，就是县官的私宅了。进了宅门往西，有一座“花厅”，是县官会客的地方，花厅西头的一个套间，叫做押签房，是县官办公的地方。花厅后边隔一个院子就是上房，那就是县官的家眷居住的地方(宅门相当于乾清门，乾清门内即“内廷”，乾清门外为“外朝”)。冯友兰观察的结论是：“县衙门是一个具体而微的皇宫，皇宫是一个放大了千百倍的县衙门。”(参见《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卷一，第12~14页)

冯台异在崇阳当知县时，为子女们延聘了“教读师爷”。功课则开设了古文、算术、写字、作文等四门；不读经书了，只读“古文”，以吴汝纶选编的《桐城吴氏古文读本》为课本。算术则从加减乘除学起。另有写大字及每周一次的作文课。功课并不重，常常一上午就完成了。冯友兰在他父亲的押签房里发现了一个“新天地”——两大箱子书，还有一些新出的刊物。书籍是新旧兼备，刊物中有一种叫《外交报》，刊登的文章都是讲世界知识和国际情况的。冯友兰对这些新玩意儿爱不释手，一有空就去翻阅，从中受益匪浅。

当时的县官，集司法、行政、军事、财务大权于一身，是这方园百里的“万

户侯”或“百里侯”。当时的县太爷审案(特别是民事案件),由他问明情由后,写个“堂谕”(即判决书)就算完事。它一般也不引法律条文,只按情理了断,就和蒲松龄笔下不少妙笔生花的判词一般。冯友兰记得他父亲审讯了一桩三角恋爱或多角恋爱的案子,结束时,以宽厚的精神宣布和奸无罪(这在当时是相当开明宽大的),并以四六骈体文格调写下了堂谕,其判决部分这样写道:

呜呼!玷白璧以多瑕,厉实阶离魂倩女;禁朱丝而不治,罪应坐月下老人。
所有两造不合之处,俱各免议。此谕。

这篇堂谕和有名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故事中的判词一样,都是风流倜傥,谐而不谑之佳作。冯友兰晚年回忆认为:“这样的判决书,现在我们看起来,简直是个笑话,可是在当时,据说是一县传诵……这件案子和这篇堂谕,如果蒲松龄看见,可以入《聊斋志异》。”

幼年丧父,母教有方

但是,冯台昇在崇阳县为官时间甚短。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夏天,他下乡去勘察了一桩人命案,回来后就病倒了。可能是太过劳累,不久后的一天中午,突然发病,呼吸急促,张口喘气,不能言语,到下午三四点钟,就去世了,时年四十二岁。按当时说法,他是得的“紧病”,实际的症状表明是脑溢血。

冯台昇的去世,使这个一度充满欢乐的小家庭失去了“顶梁柱”。当时冯友兰只有十二岁半,弟弟只有十岁,妹妹只有八岁。“幼年丧父”是中国人传统中认为人生不幸的三件大事之一(另两件是“中年丧妻”和“老年丧子”)。此后,冯友兰和弟妹是在母亲的精心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对于母亲的勤俭美德(自从到武昌后不久直到在崇阳作知县夫人时,她都没有用女佣人,且居家自奉甚俭),对子女教育的关注和远见,对乡里公益活动的热情投入,并曾开风气之先,在家乡积极筹办女校并任学监,等等方面,冯友兰有很高的评价。他记得母亲对他说起过的一则往事(也是趣事):她刚嫁到冯家来时,分工管厨房。在一个有三十多口人吃饭的封建大家庭中,这是一项烦难的家务。对于刚过门的新媳妇来说,更是面临的

一次“严峻考验”。但她干得不错，井井有条，显得治家有方。过了几天，有一位上辈的人评论说：“这个新媳妇很行，能置五顷地。”又过了几天，还是那位上辈的人，修正他早先的评论，说：“不对，不只五顷，能置（值）十顷地。”这大约是对新媳妇考核的最佳评语了吧。1944年冬，这位慈祥贤慧的母亲在唐河县老家去世，冯友兰偕弟景兰由昆明转重庆，历经抗战时期交通之艰苦，赶回老家奔丧，并写下了一篇声情并茂、如泣如诉的词赋体长篇祭文，盛赞“惟吾母之懿质，集诸德之大成”。冯先生晚年全文重抄这篇得意之作于《三松堂自序》中，并深情地写道：“母亲是我一生中最敬佩的人，也是给我们影响最大的人。”

冯友兰特别注意到他母亲对子女教育的方法之一是，她从小不在小孩的面前夸奖他。他母亲后来在冯友兰任清华大学哲学教授和文学院院长时，才告诉了他一则往事。他母亲曾问过他父亲：“照以前科举的标准，你看像友兰这个样子能去考秀才吗？”他父亲充满信心回答说：“岂但能去考，碰巧还能成秀才。”这番话，她过去从未向友兰提起，也从未向别人说过。可以让冯老夫人欣慰的是，她的几位宁馨儿，并未辜负父母苦心孤诣的厚望，个个奋发向上，后来都成就为各自领域中出类拔萃的人物。慈母的爱心培育，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冯老夫人在丈夫去世后，担起了全部生活重担。回到唐河县老家安顿停当后，首先一件大事，就是安排孩子们的学习。她说服友兰的伯父、叔父，坚持友兰父亲的主张：“无论什么学问，都需要先把中文底子打好。”所以，她主张还是请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们，让他们“打好中文底子”。随后的两年里，友兰与弟妹就和几位堂兄弟、表兄弟一起在家塾中上学，除了读古文外，还学一些比较新的东西。这也是维新变法后，新学影响逐步扩大的表现。使冯友兰印象深刻的是，老师还教他们读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

应该说，通过这些年的刻苦攻读，冯友兰确实像他父母所期望的那样，“打下了很好的中文底子”。试想：一个不足十五岁的少年，已经背诵了中国儒家文献中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还加上大量中国历代优秀的古文著作，同时也涉猎了一些当时的新学知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小的成绩。它奠定了可以在其上建造巨大学术丰碑的坚实基础。这种传统家学的滋养，使冯友兰终生受益无穷。

事实上，冯友兰的学习收获，很快就有了“牛刀小试”的机会。母亲让他到县城里去考小学，冯友兰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原来在清末，维新变法，废科

举，设学堂后，学校分为三级：县城里设小学，省城里设高等学堂，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这巧好与旧科举制时的功名相对应，即县一级功名是秀才，省一级的功名是举人，中央一级的功名(即在京城会试被录取者)是进士。所以在一般老百姓的心目中，自然也将新旧两种“三级”相对比，相“折合”，以为县里小学毕业即相当于秀才，省里高等学堂毕业即相当于举人，京师大学堂毕业即相当于进士，甚至推测朝廷也许真的会把这种功名赏给这三级学校的毕业生。因此，为了这个可能的“功名”的希望，1910年，冯友兰的母亲决定让十五岁的冯友兰结束“家学”，与景兰及堂兄五哥等一起去考“唐河县小学堂”。当时是新旧交替时期，考试仍充满旧日考秀才的格调，考试由县官主持，在县衙门大堂举行，只考一篇策论式的文章。考生恭候在堂下，县官用红笔在考生名单上某人名字上一点，“礼房”的书吏就高叫某人的名字。该生就朗声应“有”，上前领了卷子，就到衙门里指定的地方坐下，等题目发下，作文交卷就算考完了。几天之后，把考取的人集合列队于大堂前，县官在这个队列前像检阅一般走一趟，就算完成了录取仪式。那一次，当县官走到冯友兰面前时，停了下来对他说：“你的文章很好。”按照过去考秀才的惯例，县官的这种夸奖，是这位秀才的一种“殊荣”。这表明冯友兰的学习确有进益，没有让他的母亲失望。

一支雏燕已逐渐羽翼丰满了，辽阔广大的天空展现在它的面前，它渴望展翅高飞的时刻来到了。

中州公学与中国公学

在革命的时代大潮中

1911年(清宣统四年),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年代。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十多年,是清王朝腐朽势力作垂死挣扎、反清朝封建统治与反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力量急剧发展的十多年。1898年,戊戌变法被以慈禧为首的反动势力扼杀之后,维新改良的大门已经被堵死。以孙中山、黄兴、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与蜕化为保守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大论战,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扫除了思想理论上的障碍和阻力。革命派的力量尽管还不够强大,并有种种新生事物初期不可避免的弱点,但大批仁人志士视死如归,前赴后继的武装起义,彻底动摇了极端虚弱、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机器。终于,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震撼神州大地的武昌起义,推翻了清王朝,宣告了统治中国两千年之久的封建主义体制的崩溃。1912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南京宣布建立了民主主义的“中华民国”,组成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临时政府。尽管在历史的进程中,革命和反革命、复辟和反复辟、封建和反封建的斗争,还有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复杂的较量,其间还有历时达八年之久的反抗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气壮山河的正义